

“我所从事的事业要求我抱定一种态度，不为任何冲动所左右，不因任何诱惑而改变。
我并不觉得自己拒绝为人母，只不过为人母不是我的命运。”

波伏瓦 回忆录

第①卷 岁月的力量 (一)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黄蓓 罗国林 译

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 l'âge

作家出版社



波伏瓦
回忆录

第●卷
岁月的力量
(一)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黄 荭 罗国林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10-58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伏瓦回忆录.第2卷.岁月的力量.1/(法)波伏瓦(Beauvoir.S.D.)
著;黄荭,罗国林译.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063-6262-7

I. ①波… II. ①波…②黄…③罗… III. ①波伏瓦, S.D.(1908~1986)—
回忆录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510号

LA FORCE DE L'AGE
Simone de Beauvoir
© Editions Gallimard,1960

策划: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ntre du livre étrangère des Editions Mer-Ciel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européennes

波伏瓦回忆录.第2卷, 岁月的力量 (1)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者:黄荭 罗国林

责任编辑:王旻 周茹 翟婧婧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net.cn(作家在线)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印张:18.5

字数:290千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262-7

定价: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我一开始谈自己，就投入了一场不谨慎的冒险。因为开场容易，收场难。我的头二十年，我早就想谈谈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在少女时代向那个年老的自己发出的呼唤，她将把我连灵带肉吸收掉，使得我荡然无存，连一撮骨灰也不剩下。我恳求那妇人从我被她投入的乌有之中，把我抢救出来。我所写的书也许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夙愿得到满足。五十岁了，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把自己的意识给了那女孩儿，那个被遗弃在消逝的时间深处的姑娘——连同时间一块消逝的那个女孩儿和姑娘。我让她们存在于白纸黑字之间。

我这个打算也行之不远。成年之后，我不再祈求未来。《端方淑女》写完之后，并未听到我的过去发出任何声音，催促我接着写下去。我决定写别的东西。可是，我竟然做不到。最后一行下面所画的一个无形的问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自由吗？有什么用！整个战斗准备、这场大战、这场逃逸、这场胜利，我生平的续篇该赋予它们什么意义呢？可是没有用，我的书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正是它们遭到质疑。我决定写作。好的，我写了。可是写什么？为什么写这几本书，仅仅这几本书，恰好这几本书？我要求的究竟是更少还是更多？在我的头二十年空洞而无止境的希望与业已完成的一部作品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我要求的既多得多又少得多。渐渐地我相信了，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在我自己眼里要求写续篇。讲述了我的作家生涯的经历，而不试图讲述它是如何体现的，那纯属徒劳无益。

此外，深思熟虑之下，这个打算本身令我感兴趣。我的人生尚未成就，但它已经具有某种方向，未来大概也不大可能使之改变。什么方向呢？出于在这次分析研究中应该弄清楚的理由，这个问题我避而不提。这个问题，现在就该或者有一天总该解答的。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份操心仅仅关乎我。其实不然。一个人，

无论是塞缪尔·佩皮斯^①还是让-雅克·卢梭，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人中豪杰，只要他坦诚地讲述自己，就或多或少会牵涉到所有人。要讲明白自己的生活，而不在这里那里提到别人的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再说，作家总是受到下面两个问题的烦扰：你为什么写作？你是如何过日子的？除了趣闻轶事和流言蜚语，许多人似乎都想了解作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剖析一个具体例子，比抽象、泛泛地解答，能让人更好地了解情况。这鼓励我继续写自己。这种自述也许有助于消除始终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某些误解。这些误解常常让我烦恼。一本书只有了解它写作的背景、意图以及是由什么人写的，才能明了它的本意。我愿意面对面向读者说明我的本意。

然而我必须告诉读者，我并不准备讲述一切。我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不过，虽然在毫不掩饰地讲述自己遥远的过去时，我并不太难为情，也没有过分小心谨慎；可是要讲述自己成年后的生活，我就没有那么超脱、那么无所顾忌了。在这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朋友们，都不能搬弄是非。我不爱搬弄是非，因此决意对许多事情选择避而不谈。

另一方面，我的一生与让-保尔·萨特密不可分。但是，他的生平他打算自己讲述，我无意代劳，且不打算对他的思想和作品进行分析，而只叙述他与我的生活有关的事情。

有些批评家以为，我在自己的回忆录《端方淑女》里想对女孩子们进行说教。其实我主要是想还债。这本书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说教方面的用心。我仅限于讲述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没有预设任何目标，只想把有趣而且有用的真实全部讲出来。我在书里试图表达的真实，究竟对什么、对谁有益，我不知道。我希望读者同样天真无邪地阅读它^②。

① 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 Pepys, 1633—1703)，英国文学家和海军高级官员。——译注

② 在这本书里，我有意略去了一些东西，但绝不是有意说谎。不过一些小事可能记不清了，读者可能从中发现一些无足轻重的错误，但这肯定无损于整体的真实。——原注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7

第三章 /87

第四章 /151

第五章 /213



第一章

1929年9月我回到巴黎，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获得了自由。早在童年时代，和妹妹一块扮成“大姑娘”玩耍时，自由就令我魂牵梦萦。我说过上大学时我是多么热切地呼唤自由。现在突然间我自由了，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轻松愉快，令我惊喜莫名。每天早晨一睁开双眼，我就抖动全身，心花怒放。十二岁左右，我曾经因为在家里没有一个属于我的角落而感到痛苦。阅读《我的日记》时，读到一个英国初中女生的故事，我心驰神往地凝视着那幅描绘她房间的插图：一张书桌、一张沙发床和几个摆满书的书架，她就在那颜色鲜艳的四壁之间学习、看书、喝茶，身边没有旁人。我多么羡慕她啊！我头一回窥见到一种比我更优越的生活。现在我终于在属于自己的家里了！外婆把她这间客厅里的沙发、小圆桌、小摆设全搬走了。我买了几件没上油漆的家具，妹妹帮我刷上了棕色油漆。我拥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放杂物的大箱子、几个放书的书架，还有一张可以躺卧的长沙发，颜色与我裱糊墙壁的橙色墙纸很搭。站在我五层楼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当费尔-罗什洛街的悬铃木和贝尔福的石狮子。我用一个气味很难闻的红色煤油炉取暖。这种气味似乎守护了我的孤独寂寞，我喜欢它。关起门来，避开他人的目光过日子，多么惬意！有很长时间，我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房间的装饰无动于衷。大概因为我更喜欢《我的日记》里的房间，里面有沙发床和书架。不过，无论多么逼仄的房间我都能将就。只要能独自关上门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付给外婆房租。她像对待其他房客一样，不过问我的私事。我进进出出无人干涉，可以天亮才归或通宵躺在床上看书，中午睡大觉，连续二十四小时闭门不出，想上街就马上下楼。中餐我在多米尼克餐

馆喝俄罗斯甜菜浓汤，晚餐去圆顶咖啡馆饮巧克力。我喜欢巧克力和俄罗斯甜菜浓汤，喜欢熬通宵然后中午睡大觉，尤其喜欢任性率性，几乎无所顾忌。我欣喜地发现，大人们曾经喋喋不休咄咄逼人地对我讲“生活是严肃的”，其实并非那么难以承受。过去经过的一次次考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付出过艰苦努力，生怕考砸，碰到诸多障碍，累得精疲力竭。现在在任何地方都不再遇到障碍，我感觉像在度假，永远在度假。私人授几节课，又在维克多-杜瑞中学担任非正式辅助教师，日常的生活费就确保无虞了。这两项工作我并不觉得是什么负担，因为干起来就像玩一个新的游戏：我在扮大人呢。想办法找上辅导课的学生、与学校校长或家长商谈、筹划开销、借进还出、悉心计算，诸如此类事情，我做起来开心，因为都是头一回做。还记得拿到头一张支票时，那才叫高兴呢，就像是从我人手里诓骗来的。

我对梳妆打扮从来没有多少兴致，但求穿着自己中意就行。我还在为祖父戴孝，不想让别人看不顺眼，买了一件外套、一顶窄边软帽、一双灰色的薄底浅口皮鞋，做了一套搭配的连衣裙，另外还做了一套黑白相间的连衣裙。我对棉料和过去一直穿的毛料衣服反感了，便挑选了丝质料子中国绉绸，另外挑选了一种质地很差但那年冬天流行的料子打纬绒。每天早晨，我马虎地为自己浓抹打扮一番：在两颊抹一层胭脂，搽上厚厚的粉，再涂上口红。人们总是星期日比平常穿得讲究，我觉得荒唐可笑。对我来讲，从今以后天天是节日，无论什么场合，我都是同样穿着打扮。我了解到，中国绉绸和打纬绒，在公立中学的走廊里似乎不太得体；我的薄底浅口皮鞋，如果不穿着在巴黎到处走，鞋跟也不至于磨损得那么厉害。不过，这些我都在乎。化妆打扮是我不会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

我安顿下来，涂脂抹粉，接待朋友，外出。但这并不是新生活的开始。10月中旬，萨特回到巴黎，我的新生活才真正开始。

在利穆赞的时候，萨特来看过我。他下榻在圣日耳曼-勒贝尔的“金球”旅馆。为了避免流言蜚语，我们到远离镇子的乡村去幽会。早晨，我欢天喜地地跑过公园的草地，跨过障碍物，穿过还湿漉漉的草地。此前我经常来这草地上打发孤独，有时心里酸溜溜的。现在我们

往草地上一坐，就闲聊起来。头一天我没想到，远离巴黎和朋友们，这种闲聊能使我们满足。“咱们带上几本书去看吧。”来之前我建议道。萨特一听就生气了，还否决了我提出的散步的想法。他厌恶叶绿素，见到这绿色的牧场就烦躁，只有将它忘掉才忍受得了。好吧。只要给我一点鼓励，交谈我并不害怕。我们便继续在巴黎已开始的交谈。不多久我就明白，就是继续谈到地老天荒，我也会觉得时间太短。上午刚开始，午餐的钟就敲响了。我回去和家人一块吃午饭。萨特吃香料蜜面包和奶酪，是我表妹玛德莱娜放在下面那座房子旁边废弃的鸽子棚里的。表妹喜欢浪漫。下午刚开头天色又暗了，接着夜幕降临了。萨特回他的旅馆，与一些旅行推销员一块吃晚饭。我对父母说，我和萨特正在酝酿写一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希望利用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恶来哄骗他们，但几乎不可能使他们信以为真。萨特到达四天后，我看见他们出现在我所坐的草地边缘。他们走了过来，我父亲一副毅然决然的样子，但扁平草帽下的脸上显得有点尴尬。萨特这天穿了件颜色有点过于鲜艳的粉红色衬衫，霍地站了起来，露出干仗的目光。父亲彬彬有礼地请他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人们议论纷纷，我明目张胆的不端行为有损于我那位正寻求出嫁的表妹的声誉。萨特强烈反驳，但声音并不太高，因为他决计一个钟头都不提前离开。我们只有更秘密地去远处的栗树林里相会。父亲没有再来找茬儿。萨特在“金球”旅馆又住了一个礼拜。分别之后，我们天天通信。

10月份再见到萨特时，我已经与过去作了了断^①；毫无保留地开始和他相处。萨特不久就要去服兵役，暂时在休假。他住在圣雅克街他的外祖父母施韦哲家里。每天早晨我们去灰色和金色的卢森堡公园里，在石雕的王后们白色的目光下相会。夜里我们并不很晚回家。我们在整个巴黎漫步，继续着我们的交谈，谈我们俩、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我们将来要写的书，无所不谈。如今我觉得这些交谈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所谈的事情，更多的是我们以为已得到的东西——其实并未得到，我们几乎彻底搞错了。为了做到有自知之明，应该分析这些错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现实，即我们的处境。

我说过，萨特是为写作而活着。他的使命就是表现一切事物，并根据需要重新拿来进行阐述。我嘛，他督促我关注五彩缤纷的生活，

① 这一点我在《端方淑女》里讲述过。——原注

我应该通过写作，从时间和虚无中捕捉生活的五彩缤纷。这些使命显然落在我们肩上，我们确定无疑是能够完成的。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我们赞同康德的乐观主义：你应该，因此你能够。的确，意志怎么能在决断和形成的时候犹疑起来呢？这时，意愿和信念完全是一码事。因此，让我们相信世界，相信我们自己。我们反对现在这种形态的社会。这种反对不带任何邪念，它意味着坚定的乐观主义。人需要重新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塑造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考虑写书而不考虑用别的方式为这一事业作贡献。公共事务令我厌倦。不过，我们期望事件能按我们的愿望发展，而不需要我们卷入。在这一点上，1929年秋天，我们像整个法国左派一样乐观。和平看来最终可以确保了，纳粹党在德国的扩张只代表一种没有什么严重性的次要现象。殖民主义将在短期内被消灭，甘地在印度发动的运动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暴动确保了这一点。动摇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别严重的危机，预示着这个社会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觉得已经生活在黄金时代。在我们眼里，这黄金时代就是历史被掩盖的真正面貌，只要显露出来就行了。

在所有方面，我们对现实的分量都一无所知，却自夸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自由这个词，我们坚忍不拔地信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该仔细看一看我们赋予了它什么内涵。

自由这个词包含着一种现实的体验。任何活动中都显示出某种自由，尤其是在脑力活动中，因为脑力活动没有多少重复的可能。我发奋工作，必须不间断地理解和创新。对自由，我们有一种讲究实际、不容置疑的直觉。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它控制在恰当的限度之内。我们对康德的鸽子的形象感兴趣：空气对鸽子形成阻力，但并没阻碍它飞行，而是承载了它。在我们看来，已知条件是我们努力的理由，而不是对我们努力的制约。我们不想依赖任何东西。同样，我们政治上的盲目、精神上的傲慢，首先表现为我们的计划的过火。写作、创作这种冒险，如果无法想象能够绝对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意图和手段，是不敢进行的。我们的胆量与支撑它的幻想是分不开的，而环境对幻想和胆量都有利。任何外在的障碍从来没能迫使我们背离我们自己。我们希望了解和自我表达，我们欲罢不能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的存在如此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意愿，仿佛这存在是我们选定的。我们预计这种存在将会永远服从我们的意图。令我顺遂的这种幸运对我们掩盖了世界险恶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内心深处并不感觉受到

什么约束。我与父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彻底失去了对我的控制。萨特从未见过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和祖父母在他眼里从来不曾代表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两个都没有家，我们把这种处境确立为原则。我们这样做受到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的鼓舞。唯理性主义是阿兰传授给我们的，我们明确地采用了它，因为它适合我们。任何顾虑、任何尊重、任何感情的眷顾，都阻止不了我们按照理性和我们的愿望作出决定。我们觉察不到我们的内心有丝毫的阴暗和混乱，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纯洁的，我们的意愿也是纯洁的。这种信念因为我们为未来倾注的激情而更加坚定。我们不拘泥于任何明确的兴趣，既然现在与过去是不停地互相超越的。我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事物和对我们自己提出质疑，只要时机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自我批判，欣然自责，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改变都是一种进步。由于我们的无知使我们看不到会令我们不安的大部分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些修正感到满意，认为自己无所畏惧。

我们不受限制、无拘无束、毫无顾忌、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可是怎样做到在障碍面前无论如何也不致遭受挫折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口袋瘪瘪的：我勉强挣钱糊口，萨特则仅靠从他祖母那里继承的微薄遗产度日。商店里物品琳琅满目，我们都不敢问津，豪华的地方都不对我们开放。对这些禁地，我们淡然处之，甚至不屑一顾。我们并非苦行僧，远远不是。现在亦如从前（在这一点上萨特与我相似），只有那些我可以接近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触摸得到的东西，对我来讲才有实际的分量。我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愿望，追求快乐，根有没有剩余的精力可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希望上。为什么要为不能以车代步感到遗憾呢？在圣马丁运河沿岸或贝尔西码头，我们迈开两腿，不是能获得很多发现吗？我们在我的房间里啃面包、吃玛丽牌肥鹅肝，在“德莫利”啤酒屋（萨特喜欢这里的啤酒和腌酸菜的浓厚味道）晚餐时，心里没有任何失落感。晚上，我们去“法尔斯塔夫”酒吧或“伊恩学院”酒吧，兴致勃勃地品尝各种酒，如布隆克斯、西德卡、巴卡蒂、亚历山大和马丁尼等。我特别喜欢两种鸡尾酒：一种是“维金”酒吧的蜂蜜鸡尾酒，一种是蒙帕纳斯街“灯嘴”酒吧的特产杏子鸡尾酒。丽兹酒吧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呢？我们尽情作乐。一天晚上在“维金”酒吧，我正吃越橘炖鸡，乐队则在台上演奏流行歌曲《异教徒情歌》。我知道，这种宴乐如果没有异乎寻常之处，是不会令我赞叹

的。我们的囊中羞涩也能给我带来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与极尽奢华获得的即时快乐一样好吗？奢华之物可以充当与他人交往的媒介，它们的诱惑力是靠有诱惑力的第三者获得的。我们受到严格的教育，坚定不移地立足于知识，所以绝不会在王公显贵、西班牙财主、穿金戴银的贵妇、爵爷贵族、百万富翁们面前折腰。这些上层人物都是我们所谴责的制度下的为富不仁者，我们甚至把他们视为人渣。对他们我怀着鄙薄的怜悯。他们脱离群众，把自己幽闭在奢华和时髦之中。每当我经过普通人进不了门槛的富凯餐厅或马克西姆餐厅时，心想被社会摒弃的其实是他们。一般来讲，他们在我眼里根本不存在。我丝毫不奢念他们的特权和穷奢极欲，就像5世纪的希腊人不奢念电影和收音机。这金钱造成的隔阂令我们惊诧莫名，但我们并不气恼，因为我们认为富人们不能教给我们任何东西，他们的摆阔和挥霍恰恰掩盖了他们心灵的空虚。

因此，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没有什么能规约我们，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屈从。我们与社会的联系由我们自己建立，自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天天都通过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大位置的活动来体验自由。这种活动就是娱乐。大部分年轻伴侣都用娱乐和编造故事填补他们共同的过去那种无聊。我们特别热衷于这样做，因为我们性情活跃，而且暂时无所事事。喜剧、滑稽戏、寓言，我们编造的东西有一个明确作用，就是让我们避免认真的精神。我们像尼采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强烈地拒绝认真的精神。我们编造的东西把世界投射到想象之中，使我们与之保持距离，从而使世界变得轻松愉快。

我们两个人，萨特创作力最旺盛。他创作民歌、儿歌、讽刺短诗、抒情短诗、简短寓言、应景小诗，有时配上他自编的曲子吟唱。他不轻视同音异义词或音义双关词的文字游戏，以运用半谐音和叠韵法为乐事。这是尝试累赘的一种方式。他借用辛格^①的《花花公子》的故事，把花花公子描绘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流浪者，用虚假的美丽故事，掩盖生活的平庸。詹姆斯·斯蒂芬斯^②的《金罐子》，给我们提供了勒普里科纳的故事，这个地精潜藏在树根底下制作小鞋子，不把不幸、烦恼和怀疑放在心上。这两个人，一个是流浪冒险的花花公子，一个是定居不动的地精，给予我们同样的启示：首要的事情是文学。不过

① 约翰·米林顿·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爱尔兰诗剧家。——译注

② 詹姆斯·斯蒂芬斯 (James Stephens, 1880—1950)，爱尔兰诗人和故事作家。——译注

借由他们，这句格言就没了说教的迂腐。对于我们写作并珍惜的书，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客观地评价，把它们称为“我们的小鞋子”。

我们两个身体很棒，性情愉快。但是一遇到冲突我就忍受不了，会立刻脸色大变，不理人，生闷气。萨特形容我有双重性格：平常我是海狸；但有时这种动物会被一个相当不讨人喜欢的女郎取代：德·波伏瓦小姐。萨特还就这个话题变着花样发挥，总能最终使我露出笑脸。至于他，如果早晨起来后迟迟头脑不清醒，或者因为种种情况打不起精神，就常常会显得像受到偶然的打击。这时他就像防止被人抓住似的，蜷缩起身子，活像我们在万森纳动物园里看见过的一头海象，痛苦的情状让人揪心。饲养员往海象嘴里倒一桶小鱼，然后跳到它的腹部去踩。那桶美食落肚，海象抬起一双迷离的小眼睛望着天空，仿佛他那庞大的肉体试图通过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变成一副祈求的模样，但是它连最简单的语言也说不出来。那怪兽打个哈欠，眼泪在它油亮的皮肤上滚落，它晃动一下脑袋，就躺下去，被制服了。当萨特忧郁得脸变样时，我们就认为海象忧愁的心灵征服了他。他变得像海象一样：抬眼望着天空，打着哈欠，默默地祈求。这种情状唤醒他的快乐。因此，我们的心情在我们看来并不像是我们的身体分泌的一种恶劣情绪，而是我们拥有的一种伪装，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将它抛掉。整个青年时代，甚至后来，我们热衷于简短的心理剧。每当面临不顺利或困难的局面，我们就对它们进行修改，将它们推向极端，使它们变得滑稽可笑，并对它们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探索。这非常有助于掌握这种娱乐方式。

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是靠这种方法维持的。我们回到巴黎相处，甚至在我们的关系确定之前，就立刻给我们的关系定了一个名称，叫做“皇族与平民子女的婚姻”。我们这一对拥有双重身份。平时，我们是奥加那提克先生和太太，是不富有、没野心、容易满足的公务员。有时我梳妆打扮一番，我们去香榭丽舍大街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穹顶咖啡馆舞厅跳舞，我们便成了美国亿万富翁摩根·哈蒂克先生和夫人。这并不是歇斯底里的胡闹，以图让我相信能在几个钟头间体验富豪们的乐趣；而是一种讽刺戏谑的模仿，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对阔绰的生活不屑一顾，而满足于粗菜淡饭，财富对我们毫无作用。我们要求获得应有的地位，但同时力图摆脱自己的地位。被我们称为奥加那提克先生和太太那对没有钱的小资产者，并非真的是我们，我们装

扮成他们，正是为了显示与他们不同。

人们看到，我把日常工作，尤其是教师职业，也视为一场化妆舞会。这种游戏使我们的生活失去现实感，最终让我们深信：我们的生活容纳不下我们。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阶级、任何职业、任何一代人。我们的真实身份不在此，而存在于永恒之中，未来将显示出它：我们是作家。任何其他肯定的说法都是幌子。我们想遵循古代斯多葛学派的训诫，他们也把一切寄托于自由。我们全身心投入靠我们成就的事业，摆脱与这一事业无关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并非完全不做，因为我们太贪婪，只不过附带地做。客观环境允许我们保持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不受拘束，很容易诱惑人们将之与极端自由混为一谈。为了消除这种诱惑，我们有必要与我们自己拉开距离，不过我们几乎没有这种办法，而且根本没有这种愿望。

有两门学科大概能给我们启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对这两门学科我们仅有粗浅的了解。记得萨特与波利泽在“巴尔扎尔”咖啡馆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波利泽声称萨特只有“小资产者”的素质。萨特拒绝这个形容词，坚持说这个形容词不足以说明他的态度。他提出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棘手的问题。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本阶级的观点。但在什么情况下超越？怎样超越？为什么能超越？有着浓密棕色头发的波利泽怒发冲冠，讲话滔滔不绝。但是他说服不了萨特。萨特会继续承认自由的价值的，既然他如今仍对自由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严肃认真的分析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自由所抱的看法。我们不把金钱放在眼里，这正是我们能为自己提供的一种奢侈，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钱，确保自己不缺吃少穿，不会被迫去卖苦力。我们思想的开放应归功于只有我们的阶级才能为我们提供的培养和筹谋。正是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年轻知识分子的地位，促使我们相信已不受条件约束。

我们给自己提供的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奢侈而不是另一种？为什么抱着这种信念，我们都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没有昏昏入睡？精神分析学会给我们提供答案，如果我们向它求教的话。精神分析学已经开始在法国传播，我们对它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在精神病理学上，乔治·杜马^①的“内分泌一元论”^②，我们像我们大多数朋友一样觉得不可接

① 乔治·杜马 (Georges Dumas, 1866—1946)，法国哲学家、医生、心理学家。——译注

② 我们这样称呼他的阐释方法，尽管他声称赞成笛卡尔的二元论。——原注

受。我们欣然接受这种看法：精神病、神经官能症及其症状都有某种含义，而这种含义要追溯到病人的儿童时期。但是我们到此止步，作为对正常人的探索方法，我们拒绝精神分析法。我们很少读弗洛伊德的著作，除了他的《释梦》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这两本书。我们理解了这两部作品的文字，而没有理解它们的内容。其中独断的符号论和联想主义损害了这两部作品，令我们扫兴。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我们觉得像是谵妄，与我们的清教主义相冲突。更主要的是，由于赋予无意识的作用及其机械的解释的僵化，正如我们设想的一样，弗洛伊德学说抹杀人的自由。谁也没有向我们指出调和的可能性，我们也无法发现这种可能性，从而固守唯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的态度。在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身上，自由会战胜创伤、情结、回忆和各种影响。我们从情感上摆脱了童年，但很长时间不知道，这种冷漠的原因正在于我们的童年本身。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两门学科，相当多青年人都赞成，对我们触动都很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这两门学科只有一些基本概念。我们不希望用陌生人的眼光远远地观察自己。对我们而言，重要的首先是要对我们自己适宜。与其在理论上对我们的自由规定一些限制，倒不如切实地认真捍卫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点上，萨特和我有很大差异。我摆脱了过去，能自己养活自己、自我做主了。在我这无异于一个奇迹。我一劳永逸地获得了独立自主，没有任何力量能从我手里把它夺走。萨特呢，他仅仅达到了男人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即他长期来厌恶地预料到的一个阶段：刚刚失去可以不负责任的少年时期，而进入了讨厌的成年人世界。他的独立受到威胁。首先，他不得不去过一年半的戎马生涯，然后才去从事等待着他的教师职业。他找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当时正招聘一名赴日本的法语辅导教师，他在1931年10月报了名。他打算去日本待两年，希望两年后还有其他出国工作机会。在他看来，作家和编故事的人应该像辛格笔下的花花公子，最终也不会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人身边停下来。萨特并不认定一夫一妻制。他喜欢与女人们为伴，认为女人不像男人一样滑稽可笑。二十三岁的他，不想永远放弃接触各种各样风情万种的女性。“就我们之间而言，”他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对我说，“要的是必然的爱情，但是有一些偶然的私情也是相宜的。”我们是同